

我所認識的山田慶兒先生



本文作者（左一）與山田慶兒教授（左二）的合影(1996)

廖育群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1983年秋，山田慶兒先生到中國訪問，時逢「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正在西安召開會議。從醫科院校畢業不到一年的我，對於科學史這門學問還一無所知，只是作為一名會務人員被派遣到機場去接山田先生。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結識的，竟是一位對我學術生涯具有關鍵影響、使我受益良多的恩師。

山田先生住在總統套房，而我住在會務組。除了聽說他十分欣賞茅台酒外，只是在開座談會時到他那裡去過一次。記得他向我們介紹了他自己的學習經歷——1955年畢業於京都大學理學部宇宙物理學系；進入研究生院研修近代科學史；1959年碩士課程修了後，受聘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任講師。山田先生還介紹了日本研究所的教授遴選制度——當教授、副教授的職務出現空缺時，就會馬上面向全國公開招聘，並成立一個臨時的委員會就應聘者進行討論、做出選擇。這一制度意在選拔優秀人才，並盡量避免本系統內的近親繁殖。因而山田先生亦是在作了近7年的講師後，離開京都大學，到同志社大學擔任副教授；又於1970年重返京都大學任副教授，並於1978年升任教授。關於研究工作，山田先生介紹說，他們正在研讀《黃帝內經太素》及馬王堆出土醫書等新發現的中國古代科技史料，並會將研究成果匯集出版。現在回想起來，我以為可以說，山田先生的醫學史研究大致就是發端於此，而其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莫不與《黃帝內經》及馬王堆醫書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們的研究成果匯編——《中國新發現科學史資料的研究·譯注篇》與《論考篇》(1985)，相信早已為研究中國古代醫學史的學者所熟知，並從中獲得了不少啟發。

112

在此期間，山田先生還作過一次大會報告。我只記得他在結束時說：「學生當然要向老師學習，但不能超過老師的學生就不是好學生！」山田先生當時講此話的意思是：就他自己而言，固然從中國的前輩學者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但同時也有決心與信心要超過「老師」！在以後的交往中，我不止一次聽到他重複這句話，尤其是當我寫出令他欣賞的文章時，哪怕是含有與他明顯不同的觀點。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溢於言表，令我永遠難忘。兩天後，山田先生離開西安，去河南參觀登封觀星臺——那畢竟是他的老本行。

在此後的幾年中，我嘗試著做些醫史研究，但並無成績可言，心中充滿了困惑。其原因在於醫學史研究具有悠久的歷史與龐大的隊伍，只要隨便翻一下論著目錄，就會看到沒有哪個歷史人物、重要著作、理論學說、機構事件等等，不是被人反覆研究與論說。我該在何處找到「立錐」的空白之地呢？在此種尋尋覓覓的日子中，為了外語學習，開始找些東西來翻譯。因而再次與山田慶兒先生相晤——閱讀並翻譯了他的文章。誰知這種以學習外語為目的的翻譯，卻使我看到了另外一種研究方法與思路，大有豁然開朗之感。那麼，我所看到的究竟是怎樣「一種研究方法與思路」呢？說來

也很簡單，其實就是分析的方法。即不再是像通常所見，對歷史現象加以盡可能詳細的描述，或刻意於「成就」與「科學性」的闡發，而是徹底地擺脫了這一司空見慣的「套路」，致力於對歷史現象加以理性的分析，通過分析性的考證來揭示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思想脈絡、存在於不同時代之多個現象間的聯繫與發展脈絡、貌似無關之現象間的溝通脈絡等等。當環節缺失，有礙發現或建立脈絡時，則通過大膽假設（工作假說）構築解釋體系，再旁徵博引、小心求證，對假說進行驗證。這樣的研究大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而對於這樣的研究來說，也根本不必去尋找什麼「立錐」的空白之地，可以說到處都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對於這樣的研究來說，那些被人抄錄、轉引多次，已然毫無一點新鮮感的史料，似乎都又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真說不清這些司空見慣的史料中究竟還蘊藏著多大的潛能。其實，對於山田先生來說，在學問上步入「自由王國」也並非輕而易舉。用他自己的話說：

素受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更為接近西洋學問的我，要想接近陌生的中國哲學與科學並非易事。運用概念的翻譯、思考方法的歸納與定式化、模式的構築與理論的重建，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方法，努力使中國的哲學與科學成為我所能夠理解的東西。如果說其中有某些發現，那乃是由所謂東與西、傳統與近代這樣的思想性格鬥爭中產生出來的。^①

山田先生當年也吸煙，而且吸得很凶——日均五包（100支）。可想而知，原因不外就是那苦苦追求的學問。

1988年，山田先生爭取到財團資助，邀請我去訪問學習。十二月六日抵達京都，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旅日生活。

山田先生工作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一個「中國科學史研究班」，每周二下午大家相聚於此，或解讀文獻，或報告自己的研究心得。據說這種研習方式已經堅持了許多年，業已成為傳統與習慣。當時我曾想，回國後亦應效法之，在我們的研究所也開展這樣的學習與研究。但實際情況證明，要想真正付諸實踐並不容易。由是常常引導我去思考：因何而能，因何而不能？其間大抵有以下一些區別，而這些區別無不涉及一個核心問題，即價值取向有所不同。首先，要說忙，大家都忙，每一位研究人員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偶爾打斷一下、拿出半天時間去聽非本專業的報告，或讀非本專業之書，自然無所謂。但俗話說：長路無輕包，故真要堅持下去決非易事，確實可以說是一種負擔。而恰恰是這種負擔，給人以相應的回報——豐富了知識、拓展了眼界、學到了別人的研究方法與思路、聽到了他人對自己工作的批評意見、發現

^① 《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山田慶兒論文集》自序，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了新的研究課題……。我想，即便是這個研究班的領導者山田先生亦同樣受益非淺，否則他怎能迅速地從天文學史過渡到醫學史，乃至技術史等等。我曾注意觀察過，不論是讀哪個專業的書，山田先生事先都有認真準備——對於疑難之點、術語名詞、人名地名等，預先查找資料，以供大家參考。同樣，參加研討的其他知名學者，如田中淡（建築史）、宮島一彥（天文史）、川原秀城（數學史）、橋本敬造（西方科學史）等先生也都興趣盎然地學習著非本專業的知識並積極參與討論。或許只有這樣，才能將古代科學技術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認識，才能跨越學科的藩籬去認識歷史的本貌。

其次，正是因為存在著上述現實的「負擔」問題，所以要想成功地操辦這樣的研究班，就必須有一個具有號召力、凝聚力，或者乾脆說是個人魅力的召集人。



1990年山田教授(左)在北京接受中國科學院頒授的名譽教授，右為藪內清

114

我以為山田先生的個人魅力首先來源於他的學術成就，而當這種學術成就轉化成社會聲望時，自然又會增強其個人魅力。我初到京都，適逢山田先生因對日本古代哲學家、思想家三浦梅圓的精深研究而獲大佛次郎獎，附驥慶祝者甚衆。我曾悄悄問過一位乘車趕來的與會學者，來此何為？他說，會有某種好處。例如，只要山田先生寫個推薦，出版社就會接受他的書稿。名望、社會影響，對於一個學者來說，不管他嘴上是否承認，心裡總是想的。這並不是什麼壞事，因為名望與社會影響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一個人的成就，或者說可以給人以成就感。然而作為一個學者，大可不必以廣泛參加社會活動的方式來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山田先生沒有任何理事、委員一類的虛銜，而其身上的學術光環卻足以照亮周圍，令人仰慕。

三月，我在研討會上第一次作報告。雖然我的研究在極大程度上有賴於山田先生《黃帝內經的成立》一文的啟發，但我對《黃帝內經》成書時代的看法卻與他不同。說實話，我一直擔心會引起山田先生不快，但事實又是如何呢？山田先生在討論結束

時說：醫學史研究的重任應托付廖君，自己應盡快回到天文學史方面去。並重提學生應該超過老師的「格言」。隨後帶我去喝酒——我當然看出了他的興奮，心裡悄悄蕩漾著得意；同時我也第一次走進了山田先生的内心世界——悄悄地竊探著他的胸懷。^②

山田先生喜歡喝酒和吃中國料理。年之首尾，研究班總是要到位於京都市中心的「東華菜館」一聚，吃上一頓北京料理，然後再到位於附近小巷中的一個日本傳統式小酒館喝酒聊天。日本人愛喝酒是很普遍的，朋友相聚經常會一連轉上幾家酒館，喝到深夜。但山田先生飲酒有度，大約在十一點左右即會告別諸位回家。

夏天，收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陳美東所長的來函，聘請山田先生為該所名譽教授。我原以為他作為著名的京都大學的教授，未必會對此有多大興趣，但事實卻與我所想完全相反——山田先生十分高興，記得他自擬的中文覆信是這樣寫的：「您的信，使我多年的夢想成真……。」當時，我以為這純屬外國人用詞不當，作了修改。然而5年之後，當我收到他為中文譯本論文集所寫的〈自序〉時，似乎才再次走進了他的心靈世界——體會到他當時何以會有如是感動。〈自序〉是這樣開始的：

深懷對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敬意與共鳴，我致力於中國科學、技術及醫學之歷史的研究三十載。今得以如此直接地語之於中國讀者，實乃吾之榮幸，亦可說是望外之喜。^③

山田先生對於中國、中國文化的情感，由此可窺一斑。

九月，山田先生帶我到東京，參觀了東京博物館、拜訪了北里大學「東洋醫學綜合研究所」的大冢恭男、小曾戶洋、真柳誠等醫史學專家。午飯時，我問山田先生如何看待科學史研究的價值，因為在中國大陸人們總是強調科學史要為社會服務、為經濟建設服務。山田先生似乎從來沒有遇到過這個問題，想了一會兒才說：學問就是學問。其價值是潛在的、深遠的。我知道，山田先生除了晚上喝點酒一樂外，沒有任何愛好，全部心思都在學問上，但他卻從未考慮過學問的功利問題。這大概就是「古之學者為己」、「學以美其身」的境界吧。

1989年，山田先生參與了「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籌建，並被聘為該中心的教授（仍兼任京大教授）。他時常對我說，今後還要邀請我到那邊工作一年，而且是帶夫人、孩人一起來。但我卻並未當真。說實話，大概因為是第一次出國，在日本的三百六十五天，我始終處於「文化休克」的狀態之中。山田先生對我說，除了中國醫學史，還應作些日本醫史研究，但我卻說那是日本人的事。甚至在回國半年後時間

^② 此後，山田先生在論文中提到我的結論時說：“這是攻擊包括我在內所有研究者之疏漏的尖銳指責，是出色的問題提出”。見：〈伯高派の計量解剖學と人體計測の思想〉，載於山田慶兒、田中淡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482-483頁。

^③ 《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山田慶兒論文集》自序，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中，連一封信都沒給山田先生寫。每當回想起這些，都不禁感到慚愧與面赤。但山田先生從未計較過這些。仍舊不斷地為我創造學習的機會。91、93、95年，因他的推薦，我有幸多次參加「東西方比較醫學史國際會議」，學識大進。並於1995年應邀到他工作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供職一年。

山田先生轉職到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後，他本人的研究領域從中國醫學史進一步拓展到日本醫學史。並組織了一個以「日本古代疾病與醫學史」為中心的研究班，成為日本醫史界新老人物及衆多海外學者聚會的中心。這時的我已然不像當年那樣任性與幼稚，不僅不再認為研究日本醫學史是日本人的事，而且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心中充滿著要與日本學者一比高下的激情。每當寫好一篇論文或講演稿，山田先生都認真地幫我修改，每每令我感到老師對學生的深切關懷。

專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石田秀實先生也是研究班的成員，山田先生還將其聘為該中心的課座教授。但有一天，我在閱讀石田先生的著作^④時，無意發現其中有一章是專門批判山田先生的觀點，而且是點名批判。這真的令我震驚——為山田先生的寬廣胸懷而震驚！

我知道山田先生愛吃中國料理，而我的宿舍又在研究中心內，故時常備下酒菜，邀他與其他友人到寒舍小聚。但山田先生此時已因心臟病而戒酒，令我們感到非常傷感——唯一的樂趣也不得不放棄。不！應該說還有學問，這才是先生一生最大的樂趣！

有時，我和一些同屬學生輩的中年日本學者會在一起談論山田其人，他們以為山田先生過於嚴厲，這真讓我感到費解，因為我從未有過這種感受。於是他們會說：不一樣啊，山田先生對你是特別的啊！話語中流露著些許嫉妒。這當然會使我感到幾分得意，但細想其因，先生的厚愛，那種被說成是不一樣的眼神，完全是源於老師對得意門生的欣賞。記得有人在分析何以諾貝爾獲得者的弟子又多有獲獎者時，認為除了因緣關係外，老師與學生間的相互追求是重要原因之一，即老師在選擇學生時要有目的地追求值得培養的對象。我以為山田先生屢屢為我創造學習的機會，完全是出於這一動機。他在我晉升研究員時寫下了這樣的推薦意見：「廖育群在中國醫學史研究領域中，是我目前最矚目的學者。我確信，早晚中國醫學的全體像必由他手而被改寫」。如此評價，絲毫不會使我感到驕傲。相反，只能感到無比巨大的壓力。先生的一切努力，無疑都是為了這門學問，為了造就人才。如果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能多一

^④ 《氣流れる身體》，平河出版社，1987。

些像山田先生這樣的老師，如果我們每一個飽受前賢恩惠之人都能像山田先生那樣竭盡全力培育後學，豈非學界幸事、社會幸事哉。就我個人而言，又如何才能不負先生厚望？在學問方面我始終沒能做到像先生所期望的那樣——超過老師，因而至今也還算不上是個好學生。

1997年四月，山田先生退休。他沒有像一般的日本教授那樣，退休後再到私立大學幹上幾年，儘管這能掙不少錢；儘管大家都說，像山田先生這樣的知名學者不愁沒人請。我曾問過他，退休後有何打算？他說：自由了，幹些自己想幹的事。我一直猜不出什麼是他想幹的事，是否會是詩情畫意的文學作品呢？今年四月收到先生的信，方知：

長期背負之課題可大體完成。打算從此致力於新的主題。首先再寫一本關於中國古代醫學的書，然後是日本近世、中國明清、歐洲文藝復興之後的研究。無論如何要卸下重荷，自由地展翅於夢。

我知道，山田先生在夢中常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原想今後不再作翻譯之事，但若山田先生果真游了「桃花源」，寫下了夢中美景，我又怎能割捨得下，不讓大家共享其樂、俱知其美呢？看來還得繼續作下去。